

第一章 1970

世界开始了。

开始于我的记事儿——是狠狠摔在泥水里的惨痛一跤开启了我对周围世界的记忆之门。

在这一年，夏天，一个下午，一场暴雨过后，天空中有道传说中的美丽彩虹出现——正是一个孩子眼中初见的彩虹，让时龄刚满四岁的我有点喜不自禁，有点忘乎所以，从自己家中一扇窗玻璃的后面跑了出来，来到家门前的一小片空地上——那正是我平时独自玩耍的领地，这一次大概是因为过于兴奋，我跑得远了点，跑到院子里别处去了，到达了此前从未独自深入过的陌生地段……我沉浸在忘情的喜悦之中，没有注意到离我不远的地方正聚集着七八个和我年龄相仿个头差不多高的孩子，为我备下了来到人世之后的最大危险。

你玩过“开汽车”吗？

这时候，我玩的正是“开汽车”：双手握拳向前伸出，模拟着司机手把方向盘的姿势、口中“呜呜”模仿着汽车行进时所发出的雄壮的声音，间或还要发出“哗哗——哗”的喇叭声，埋头专注地“开”着，不过是一路小跑着向前……那一刻，我的感觉一定是开着一辆解放、东风或是黄河牌的大卡车——这绝对是我来到这世上以后最早的崇拜之物，也是在这一年，我因在纸上成功地画出了一辆黄河牌大卡车并且没有忘记画出它的油箱而被我的监护人——即祖母认定是一个“天才”。

不知不觉间，我把“车”已经开到了那堆孩子面前，埋头开“车”的我没有注意到他们正有点百无聊赖，无所事事，有俩家伙已经开始对我戳戳点点……

“四川球子！”他们中有人朝我喊了一声。

“开车”太好玩了！我像没有听见似的继续“呜呜”地开着自己的“车”。

“四川球子，拉屎不擦勾子！”有人继续喊道，我注意到：是住在我家隔壁的习小羊。

“四川球子，拉屎不擦勾子！”

“四川球子，拉屎不擦勾子！”

“四川球子，拉屎不擦勾子！”

……

这堆孩子也随之齐声喊了起来——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幕情景已不是头一回见识，就在那一年里，我每次随祖母出门的时候——祖母已经不能远行，通常会叫一辆人力三轮车拉我们出门——这些孩子总是朝着三轮车上的我们猛喊，喊出的也正是这些话。

喊声太大，我因受此干扰便停下了“车”，立在原地，有点困惑不解地呆望着他们。

没想到：他们竟一下子住了口，没了声儿。

“瞅啥呢？”孩子中个头最高的那个冲我嚷道，我知道他叫刘虎子，是这群孩子的“头儿”，他们称他为“大将”。

我不敢吭声，连大气都不敢出，心中只是害怕。

这时候，我看见习小羊在刘虎子耳边低语了几句（在这群孩子中习小羊似乎担任着“军师”的角色），刘虎子听罢明显地生了气，一下子蹿到我的面前，恶狠狠地问我：“瞅啥呢？瞅啥呢？！你得是不服？再瞅把眼珠子给你抠出来……”

我几乎听不懂他说的西安话：从口音到内容，都听不大懂。当时，我只是因为心中发虚，极度害怕，刚随祖母从成都来而只会说四川话的我，用刚在心里偷偷学会的第一句西安话做出了一个回应——我说：“贼你妈！”

刘虎子乍一听，完全呆愣住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你……你说啥？！”

“贼你妈！”

“你狗日还会骂人呢得是？你得是不想活咧？！”

“贼你妈！”

“你还骂？你再骂！”

“贼……”

这回我骂声未落，脸上已挨了对方的小拳头一下，火辣辣的生疼，未等反应过来，脑袋已被刘虎子的胳膊死死夹住，夹在其腋下，脚也被他伸脚绊住了，一下摔倒在路边的一片泥水之中，其他小子一拥而上，一人踹上一脚——致使我每一次试图从泥水中爬起来的努力都遭到了惨痛的失败，脸上全是冰凉的泥水，还有热热的泪水，交流在一起……是的，我早已哭了，面对如此围攻，除了哭，我什么都不会，我哭着喊我的监护人：“奶奶！奶……”

在我的祖母闻声赶来之前，刘虎子从雨后的地面上抓起一把软泥强行塞到我嘴里，让我在狗啃泥的下场中开始对此世界产生了最初的记忆：到了三十五

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那泥的滋味是一种怪怪的苦，叫人恶心欲吐！

那一天，我那七十三岁的老祖母从家中跑出来，在大暴雨后湿滑的路面上，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地朝我跑来，一边跑一边用她那满口的长沙话高喊着我的乳名：“索索！索索娃！谁又欺负你了……”

作为早年国立女师大的一名学生，鲁迅用不朽的文章纪念过的“刘和珍君”的同乡兼同学，她并不是一个小脚老太——她的一双大脚板在泥地上留下了一长串脚印。

她把我这个小泥人儿从那摊泥水中拉起来之前，那帮孩子已经四散奔逃而去，祖母厉声问我：“谁？是谁？谁干的？！”

“刘……刘……虎子……呜呜呜……”我满嘴脏泥地哭着回答。

祖母到底是当年跟在刘和珍烈士的后面游过行的，当机立断——极富斗争经验地一把拉起我，穿过整个家属院，来到了位于东头的刘虎子家，一挑门帘便进去了，刚巧刘虎子的爹刘书记在——此人是父亲所在的国测局测绘大队的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是这个单位的“第一把手”，因为老在单位里带领大伙抓革命促生产，以往他很少有白天在家的情况，这天之所以早早地回到家中老实呆着，似乎只是为了挨上我祖母的这一顿深刻教训——

“老刘，你看看！你看看！看看你们家虎子把我们索索打成什么样子了！把娃儿摔到水里，还朝嘴里头塞泥巴……”

这个刘书记是个“三八式的老干部”，一个头上没毛的小老头模样——因为他，我心目中的老红军便成了这副样子。他共有四个儿子，这最小的儿子就是刘虎子，更像是他的孙子，他一看我那副可怜巴巴小泥人儿的样子，就嘶哑着喉咙用他那满嘴的陕北口音喊他在那在门外的小厨房里做晚饭的老婆来给我清洗，他的老婆马上跑来，可我祖母愣是不让她动我，继续给老刘上课——

“老刘，说起来我们家还救过你的命对不对？你忘了前年冬天你被造反派用铁棍快打死的事情了，忘了吧？是索索他爸爸把你背到医院里去的，那天还下着雪，院子里的雪地上全都是你的血……为了救你，索索他爸还被打成了保皇派！你是不是都忘了？你这是对救命恩人的娃儿恩将仇报……”

祖母所讲的这件事，我在后来又在父亲的口中听到过那么一次，印象至深的是雪上有血的这幕刺目的图景。

“老刘，你三八年参加革命怎么了？你三八年参加革命就可以欺负我们老百姓吗？！索索他爷爷是二七年就入党参加了革命的，比你资格老得多……”

面对刘书记这个标准的“三八式老干部”，祖母讲出的绝非虚言也是事实——只是这事实是不那么完整的：我祖父的确是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刚一入党，就发生了“四·一二”大屠杀，到处在杀共产党，祖父带着

新婚的祖母从北平跑到天津，从天津乘船去了南洋，在新加坡生活了几年之后又回到了中国，祖父在历史上的这个行为后来被定性为“自行脱党”……

“老刘，你是老党员老红军老革命，还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可是你看看你都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四个儿子，一个被政府镇压了，两个还在里头关着呢，剩下这个最小的，整天不干好事，带着一帮小孩专干坏事，今天欺负这个明天欺负那个，对孩子，你怎么能生而不教呢？！”

祖母的最后一番话可真是直刺老刘的心窝子：他的老大是在几年前本院孩子和对面“六号坑”的孩子之间所发生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群架之中因为捅死了人而被枪毙了的，老二老三也是因为在这次事件中将人打伤致残而正在服刑，在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上，这个没文化的老革命真是一筹莫展，可谓“养虎为患”……听完祖母这番训教，老头像个老猴子似的“嗷”地叫了一声，奔出门去，先在自家的小厨房里抄了一把火钳，然后跑到院子里去了，一边叫骂着一边到处找他的那只“小老虎”……

放在平时，别人家的孩子受了这家“老虎”的欺负是断不敢找上门去的，只能忍气吞声，躲在家里唉声叹气……所以，祖母此举便成了轰动整个家属院的一大“壮举”，当时被人称颂，日后常被提及，院子里的人怀念起祖母来的时候，首先是提到这件事。

此事的最终结果是：刘虎子被他爹从我们所住的家属院的露天公厕中一个爬满蛆虫的角落里拽了出来，强行拖过整个院子，屁股被火钳子夹烂之后，人还被绑在院子里的一棵老槐树上示众，直到天黑以后，我祖母再度上了刘家门，替他说情之后方才解了下来，孩子饿得连哭都顾不上了，进屋后端起碗连喝了两碗稀面条。

可以肯定的是：人之初，性本善，四岁的我还是一个好孩子，所以这个结果竟然并未让我感到幸灾乐祸，这一天里因我而起的事端反倒加深了我的一大困惑，让我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我隐约感到是我来的地方不对，可我真是从那里来的吗？

一个孩子对于自己出生的了解只能仰仗于大人的相告——连谁是我的母亲都是别人告诉我的，何况我的出生之地呢？先是祖母后是父亲告诉我：我于文革爆发的1966年出生于成都这个地方，是我的母亲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将我生下来之后寄养在祖父祖母家里的，母亲在上海工作，父亲在西安工作，他们是同一所大学不同专业的同学，在大学里谈上的，在婚后一直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中。我跟着祖父和祖母长到三岁的时候，祖父因患肺癌去世了，我便跟随祖母来到西安父亲这里，父亲所从事的地质工作的性质就是长年出差在外，所以平时家里头老是我和祖母两个人。

记忆中的祖母是一个话很少的老太太——别看她在老红军面前那么能说，后来我才从父亲那里了解到这跟祖父在前一年的去世有关，她喜欢讲成都家（那才是她和祖父的家）里的事，说我们住的是木质的小楼，我就在纸上画一个小木楼；她喜欢讲我的祖父，患肺癌去世的祖父一辈子离不开一只烟斗，我就在纸上画上一个叼烟斗的老头；祖母说在成都的家中给我买过一只斗鸡，我在四岁以前最爱玩的游戏就是找人斗鸡，我就在纸上画了一只鸡——不记得斗鸡长什么样，就画成普通的公鸡的样子；祖母还讲到过我在两岁那年曾经历过的一场大劫，不但吃错还吃多了药，是我的保姆李婆婆把我救过来的，她不停地给我灌绿豆汤……我就依照祖母的样子，在纸上画了一个老太太。

我曾主动地问过祖母：我们是怎么从成都来到西安的？祖母回答我说：是坐火车来的，坐了很长时间的火车，钻了很多的山洞，才来到这里。我就在纸上画了一列有着很多车厢的火车，还有长长的铁轨……

脑子里毫无印象的成都代表着我的过去，现如今它却成了我的一大麻烦，怎样才能摆脱掉这个麻烦呢？我意识到我之所以被人骂成“四川球子”，是因为我一张嘴就是满口的四川话，想要免遭欺负的话，我就必须和那些欺负我的孩子说一样的话，操相同的口音，四岁时我开始有了摆脱自己原乡音的自觉了，为的是与地方主义做斗争，从“贼你妈”这种骂人话开始学起，我开始转而说本地话——也就是西安话。

除了被人骂作“四川球子”之外，还有一大麻烦我也意识到了，祖母每次带我出门时都要叫一辆人力三轮——我发现那些孩子恨那三轮车，恨坐在三轮车上的我们，每当我们坐上三轮车，就是他们骂得最凶的时刻，他们骂我祖母是“地主婆”，骂我是“地主崽子”——我后来从父亲口中了解到：叫三轮车出去下馆子吃饭是祖母从成都带来的一种生活方式，祖父生前是一家大型纺织厂的总工程师，可以保障这种生活方式，祖父去世以后，家里的经济条件已不允许，但祖母已经改不了这个习惯……我意识到三轮车是一种麻烦之后，就拒绝再坐了，搞得祖母很是生气，因为她是走不了太远的路的，不坐三轮车，她就出门不便了。

我半年可以见到父亲一次，一年才可以见到母亲一次——在上海工作的母亲和上海这座城市一起成为我朦朦胧胧的一种盼望和向往，但并非是真的需要，在我四岁以前，有个奶奶就什么都有了。

那个傍晚，在刘虎子被其老红军的爹打烂了屁股然后绑缚在大槐树上的那个时段里，有一个说话声音像乌鸦身上气味赛狐狸的大男人跳将出来，呜里哇啦说了一串话，像是在和谁吵架，他的意思是：不该这么惩罚孩子！小孩之间打打闹闹都是正常的，不存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他在院子里讲的话让屋子里的

祖母听了很是生气，个中原因有点复杂：此人是我家隔壁邻居的男主人，是那帮坏小子的“狗头军师”习小羊的爹，习小羊参与了今天殴打我的事件（还是个出坏主意的），其父不但对其未予追究，还从家里跳出来干涉别人家教育自己的孩子——他此举其实是在舔领导的屁股，别人舔舔很正常，可他是谁啊？他正是文革中这个单位造反派的主要成员，有其父必有其子或者说有其子必有其父——他在造反派里担任的也是诸如“军师”一类的角色，造反派用铁棍将刘书记抡得头破血流的那次，他虽未动手，但也在现场，见死不救……如今，最乱的时期似乎已经过去了，书记还是书记，而他依然什么都不是，作为一名搞业务的，甚至连一线跑野外的工作也不让他参加了，这会牵涉到野外补助等待遇问题，所以这条咬人的狗又舔上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坏蛋”的出面相劝，反倒使那个被绑在树上的孩子受了更长时间的罪，那个老红军老革命经过文革中的那番冲击之后总算能够认清谁是好人谁是坏蛋了，现在一边是将他打得头破血流差点一命呜呼的造反派的“军师”，一边是大雪天里用架子车将他拉到医院救过他一命的恩人的儿子，坏人越劝他反倒越加固执，宁可让自己的崽子多受点罪，直到我祖母再度上门说情……

隔壁这家人有点坏也有点怪。

女主人是个疯子，也就是说：习小羊有个疯妈，习小羊他爹有个疯老婆——从外表上让我这个四岁小孩都能够一望便知其疯，她的发式很特别，不同凡响：是文革中挨斗时被强行剃成那种阴阳头式被她自己顽固地保留下来了，她自己保留了这个发式——每回理发时，她总是对着镜子拿剪刀一定要把自己剪成这个样子。因为疯了，病休在家，所以老是能够看见她，老是见她在露天的公用水龙头前没完没了地洗洗涮涮，一边干活还一边自言自语，但从不正眼看人。

习小羊的爹经常打他的疯妈，几乎每晚必打（这让我在成年以后的回想中想到了更加丰富的内容），白天也曾公开当众暴打——那是我来到世上对野蛮与残忍的初次领略：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那么疯狂地痛打一名弱女子，就像狼在吃羊……我的观看每回都被祖母制止了。因为他家就在我家隔壁，加上当年所住的这种青砖盖的老平房又是不隔音的，所以每天晚上发生在这个家庭的暴虐我们都能听到：男的愤怒地叫骂不止（真不知他怒从何来），然后是一通劈劈啪啪的痛打，比较奇怪——让我在懂事以后回想起来想入非非的是：他打着别人，打着女人，自己竟然发出亢奋之声，而被打的疯女人反倒是无声的，一声不吭，就跟不存在一样……

后来我听父亲说：连习小羊他妈的疯也是习小羊他爹这个“坏蛋”的“杰

作”，习小羊的妈原来不但十分正常，甚至还是一个冰雪聪明的江南女子，在大学里读书时就属于品学貌俱佳的好学生，后来在工作岗位上也是很出色的，她在当年下嫁给习小羊的爹就曾被单位里的同事私下形容为“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那个一身狐狸味的烂男人却长了一张小甜嘴，自命清高等人来追的“才女”正好上当。而她的疯是这样造成的：因为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了对林彪、江青等中央领导人的私人性看法而被急于寻找机会爬上去的其夫偷偷交了上去，在文革之中多次被剃成阴阳头当众批斗，几回下来人就发了疯，严重的时候还会在精神病院住过一年……

虽然这次没挨打，但习小羊也是他爹经常痛打的另一个对象，和他的疯妈不同，他每次挨打时都会像屠宰场里正在挨宰的小猪一样吱哇乱叫大声哭喊的，让我和祖母在隔壁听得一清二楚，有时候，善良的祖母还会用她的手杖敲击几下墙壁，以示劝阻。

我挨打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一切又恢复到往日的宁静，我还是在家时看小人书、画画；然后一个人到院子里去玩，再见到这帮孩子时已经有点不惧，他们似乎也不敢再惹我了，谁让我有一个厉害的奶奶呢！

这是一个蝉声飘荡的夏日午后，按照惯例，祖母在家中睡午觉，我是从来不睡午觉的，自己玩着，并将自己最得意的玩具——那是远在上海工作的母亲送给我的一辆小坦克，从我家门前的空地上开到了习家门前，嘴里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正开得如痴如醉时，一对穿着咧开了嘴的破凉鞋脚趾缝间脏得渗出黑油泥来的小脚丫子，出现在了我坦克行驶的正前方，像两个难看的碉堡，挡住了坦克的去路……我抬头一看，见是习小羊蟋蟀一般的大圆脑袋，脸上还挂着一丝难以捉摸的笑意，我刚想让我的坦克绕道而行，他一只肮脏的臭脚丫子已经踩到了我的坦克头上，结结实实地踩住了，还踩痛了我的小手指头！

这辆挺新的小坦克可是我心爱的宝贝儿！有个情况足以说明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当时我已经不满足于玩玩具了，而是热衷于拆玩具，用家里的小螺丝刀把别的汽车玩具拆开了，搞清楚里面的奥妙再重新安装好（又被爱我如命的祖母视为“天才”之举），但唯独这辆母亲送给我的坦克却从未遭受过“大卸八块”的待遇——原因是：我怕拆开了自己装不好。

而现在——它竟然被人践踏在脚下！

“莫踩我坦克！”我这个“四川球子”，自然还是一口的四川话。

“你这个四川球子！地主崽子！就知道让你家地主婆护着你……”居高临下的习小羊说。

“莫踩我坦克！”我将自己的声音提高了，口气十分坚决。

“行，叫我一声爷，我就不踩了……”

“莫踩我坦克！”

出离愤怒的我终于等不及了，从蹲姿猛然跃起，一头顶在习小羊的裆部，使其仰面朝天地摔了一个重重的屁股墩儿，与此同时，我的小手已经迅速从地上抓走了我的宝贝坦克。

我眼看着面对我的突然袭击有点发傻的习小羊从地上爬起来，嘴里骂着“贼你妈”之类的脏话朝我猛冲上来，在他蟋蟀般的大圆脑袋就要顶上的时候，我近乎本能地挥起手中的坦克照着他的头来了一下！

他一下停住了，疼出一个龇牙咧嘴的表情……

我傻呆呆地看着他，心里其实怕得狠！

他又骂着“贼你妈”朝我扑过来，在其小手抓住我细脖的同时，我再度挥手用那坦克照着他的蟋蟀头更狠地来了一下！

——我听到“咣”的一声……

抬眼看时只见习小羊的额角正在淌下一长串红色的鼻涕虫！

习小羊一摸见红，“哇”地哭叫了一声，拔腿就朝他家跑……

我也吓得赶紧跑回家，对午睡起来的祖母只字不敢提……

到底是孩子，当天傍晚时，我已经将白天的事儿忘光了，又去门前玩耍时，看见了额上贴着一块纸头的习小羊，他手里正拿着一块夹满辣子的馍在吃着，见到我，竟不敢走上前来，隔着一段距离，犹豫了半天才开口说话：

“索索……”终于有人喊我的名字了（原来他们是知道我名字的呀），“把……把你坦克给我玩一下？”

“……”我犹豫着，只是有点舍不得。

“你等着！”他说，然后转身跑回家去，出来时手里端着一辆怪模怪样的泥坦克，又说：“你玩我的，我玩你的。”

我因为对他手里的那辆泥坦克感到十分好奇，就把自己那漂亮的宝贝坦克给他玩了。

当天晚上，我还把他领到家里向他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其他玩具，这个有着一个坏爸爸和一个疯妈妈的孩子，从来就没有玩过什么玩具，有些玩具连见都没见过，他第一眼见到我的那堆玩具时突然发出了“呜”的一声……

就这样，我和习小羊化敌为友了——他是我来到西安以后所交到的第一个朋友，也是我记忆之中的平生第一个朋友，我的第一个朋友是通过暴力的方式获得的，这让我对暴力有了初步的好感。

习小羊还是老挨打，由于是经常性的，是家常便饭，他似乎倒不怎么害怕了似的——我发现真正让他感到恐惧的是挨打之后的另一项惩罚：挨饿！饥饿才是悬在这个孩子头上的一把利剑——他爹真是一个“坏蛋”，每次将他打完之

后就直接吊销了他吃饭的资格，背着他爸，他的疯妈私下里偷着将剩饭拿给他吃，一旦被发现也会马上挨顿打。和我成为朋友之后，他随时可能面对的这一个大威胁被解除了，他挨完打就跑到我家来吃饭，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吃过一顿饱饭之后小舌头从嘴里头伸出来舔着嘴唇说的话：“索索，你家的饭真好吃！”——我那善良的祖母听了之后很开心。这不仅仅是一个孩子饿极了之后吃顿饱饭才有的感受，他说的是实情：本来南方人比北方人在吃这方面就更讲究一些的，再加上我们从前在成都的生活还算优越，祖母把这改不了的讲究吃的习惯带到了这里，后来父亲就曾提起过：祖母炒菜总是放油太多，搞得我家每月的定量油总是不够用，还得去买议价油。

由于不理解，我曾向习小羊问起过他妈挨他爸打时为什么不哭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他爸不准她妈哭，哭了就会打得更狠。他还说出了一个情况：他爸在晚上打他妈时还要脱光了他妈的衣服打，他爸自己也要把衣服脱光，扇他妈的耳光，抡起皮带抽他妈的身子，然后爬到他妈的身上去，啊啊啊地使劲压……如此一来，他爸就高兴了——习小羊这段触目惊心的描述后来一直在我的记忆中储存着，到时候忽然明白过来，当时的反应是恶心欲吐！

忽然有一天，习小羊神色严峻地跑来告诉我说：因为他跟我玩了好了，刘虎子就不高兴了，放出话来说他是“叛徒”，并准备将他“开除出革命队伍”。习小羊说完之后脸色都变了，这个情况看起来要比他爸揍他都令他感到恐惧，从我家离开之后，他赶紧颠颠儿地去找刘虎子——这小子确实有颗“军师”的脑袋，马上想出了一个既不弃我而去又不被刘虎子“开除”的点子来：那就是说服刘虎子“收编”我，并列举出我存在的价值——就是有一大堆好玩的玩具。刘虎子听此建议之后的表态是：可以，但我必须当众从他的裤裆底下钻过去。

四岁的我自然不晓得这世上还有什么“胯下之辱”的典故（刘虎子肯定也不懂），我准备接受刘虎子同志领导的这支“革命队伍”的“收编”，在习小羊转告我之后我就做好了钻人裤裆的准备：钻就钻吧，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没有比孤立和孤独更可怕的了！

这个钻人裤裆的“收编仪式”是在家属大院那个露天公厕前的一个沙堆上进行的。

院子里头所有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来了，一数将近十个。

由习小羊担当主持人一类的角色。

刘虎子大模大样地撇开两腿，等着我钻。

习小羊招呼我跪下来，双手前伸，支在地上，做出狗一样的姿势。

围观的孩子发出了一阵讪笑。

习小羊指示我向前去，我也就向前去。

当我的头终于钻进了刘虎子的裆下的时候，我嗅到了一股浓重的尿臊气——就像我头上的天空快要下尿了……

这种气味让我很不愉快！

我想尽早结束，就想继续朝前钻，却发现钻不动了，这个坏小子用双腿使劲夹住了我的脖子。

“唉！钻呀！钻呀！”他在上面说，“小狗娃，你倒是给我钻呀！”

我想钻但却钻不动，我的细脖子已经被他夹得生疼。

那些孩子哈哈地笑成了一片。

“虎……虎子，你让人家索索好好钻嘛，再一下就钻过去了……”我听见习小羊在劝刘虎子。

“滚蛋！滚一边去，你狗日到底站在谁一边？！”刘虎子在斥责习小羊。

我又闻到那股子令人窒息的尿臊气了！这让我忽然变得十分的不耐烦，索性使出全身力气，猛然站了起来——这刘虎子也就被顶了起来，顶在半空中，然后摔在沙堆上，他完全没有想到，所以有点发傻，过了好半天才冲我说出一句话：“你……你狗日不想活咧……得是？！”

“贼你妈！”由于跟习小羊玩了一段时间，我用本地话骂人已经比先前地道多了。

骂完之后我便扬长而去了，独自穿过大院，回到了自个儿家。

不要小看此举，令我在院子里的孩子中声威大震！

也许祖母说得没错——打小在成都时我就是个玩斗鸡的角色，还是有那么点儿斗鸡本色。

这个夏天——这个占有我生命中最初记忆的1970年的夏天，我是和习小羊一起玩过去的。到了后来，已经有好几个原来跟着刘虎子的孩子“叛变”到这边来，加入了我们的玩耍。经过这个夏天，我最大的改变是在口音上，可以这样说：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我已经彻底背叛了自己的原乡音，从原先的“四川球子”蜕变成一个西安娃了。

面对我的蜕变，祖母很不适应似的，每次我对她讲西安话的时候，她都以满含困惑的怪眼神望着我，她还不适应我老实呆在家中的时间正在变少——我的世界正在一天天变大的事实。秋天到来的时候，她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烦恼。

老人觉少，总是起得很早，每天早上，当我起来的时候，祖母都会把早饭做好。这天也不例外，起床后我坐在外屋的小桌前吃早饭，这时，祖母正在里屋扫地。我端着一小碗大米粥，正要把一只煎蛋朝嘴里送，只听里屋传出了“咣当”一声响——像是玻璃瓶子碎在地上所发出的声音……

我马上站起来，跑到里屋门口，只见地上一片湿漉漉的红色——像我尚未

见过的血！

祖母正拿着一把长扫帚呆立在原地，不知所措，一动不动……

“咋咧？”我用生硬的西安话问祖母，语气中不乏有怪罪她的意思。

“书架顶上的那个红墨水瓶掉了下来，我又莫碰它，它怎么会自己跳下来呢？”祖母回答说，有点像在自言自语。

这便是发生在这天早晨的被传说成我家闹鬼的事件：一大瓶红墨水从我家书架顶端跳将下来，染红了我家里屋的一大片砖地——就是这样一件事，让我的祖母心神不宁起来，她反反复复念叨的一句话是：“我又莫碰它，它怎么会自己跳下来呢？”

祖母把地上的碎玻璃扫干净之后，那很大的一块红色便留在地上了，红墨水渗透到地上的青砖里去了，很难擦掉……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

祖母到院子里的公用水管边洗东西时，碰到了老是把在那里洗洗涮涮个没完没了的疯女人——习小羊他妈，她一见到祖母就说：“昨儿晚上我梦见索索他妈了，她病了……”——她如此说来并未让祖母感到太过突兀，在情感上还有一个真实的出发点：她和母亲在大学时代毕竟是同一个学校的校友，在发病之前还和母亲关系不错，往来密切，互有好感，甚至是相互欣赏的——都是冰雪聪明的江南女子嘛！她发病之后，母亲每次回来探亲也都不忘登上门去看她，还给她从上海带来一件小礼物什么的。由于我母亲对她好，她就常常念叨我母亲，她认为在这个家属大院里只有不常回来的我母亲是个“好人”。疯女人梦见我母亲病了的事加重了祖母的焦虑，但在当时，她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我，而是在事后告诉了我的父亲。

终于到了一天傍晚，很多天来怪事多多而引起的心事重重让祖母感到身心俱疲，吃过晚饭连碗都没洗她就进到里屋的床上躺下了，那时我已经呼啸着跑到院子里玩去了……

这时，正是暮色降临时分，屋子里的光线正在暗下来，准备小憩一下的祖母没有开灯，就那么躺在床上，她忽然听到有人在叫她：

“姆妈！”

从这柔声细气的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里，祖母已经听出这是她温顺的儿媳——也就是我的母亲在叫她，祖母一惊，睁眼定睛一看，只见一个白衫人站在眼前——是我的母亲穿着一袭白衫，面色苍白一副病容地站在她床前，对她说：

“姆妈！我病了！你们怎么一个都不来看我呀？我想索儿了呀！”

祖母心里害怕，伸手打开台灯，白衫的母亲便在眼前消失了……再次关上

台灯，却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以上是我对祖母在事后所做的叙述的转述——祖母在事后讲给人听时，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当时她根本没有睡着，其实也无睡意，甚至连眼都没有完全闭合。

第二天一早，祖母又在家属院门口招了一辆好久没有叫过的人力三轮，带上因为想和小朋友玩而极不情愿的我一起去到东关邮电所，给在野外工作的父亲拍发了一封电报。

越来越多的孩子，“叛变”到我这边来了，起初还有点偷偷摸摸，后来则变得光明正大——在我和刘虎子之间，他们选择我这边，当然不仅仅是由于玩具的吸引，习小羊说是因为我好玩，他在私下里说刘虎子除了爱打架，其实不会玩别的。

又是晚饭以后到天黑以前那段天堂般美好的时光——那个时段往往是孩子们聚得最齐的时候，是一天之中玩的高潮。我、习小羊等五六个孩子来到公厕前的这个大沙堆上用沙子垒碉堡，正玩到兴头上，刘虎子带着另外两三个孩子出现在了附近，起先是站在沙堆之外稍远一点的地方默默观望，然后就怪腔怪调地从习小羊开始“点名”，他想挨个将他们一一都叫过去——可是，这小子显然高估了自己的淫威，结果是除我之外的所有名字点过去两遍之后，愣是没有一个孩子站过去——其中有那么两三个胆小的犹豫了好一阵儿也还是没有站过去，此招不灵，他便破坏之心顿起：在沙堆边缘捡了好多小石子，然后朝着我们这边一一投来，石子虽小，砸在脑袋上却也是生疼的，我们这圈人便跑开了，如此一来，刚刚垒好的碉堡便暴露于外，刘虎子带头冲了上来，将那座沙子的碉堡几脚便踢毁了！

眼见心血之作被毁，我怒火万丈地骂道：“刘虎子，贼你妈！”

“啊哈！”刘虎子一脸赖笑，“你个四川球子啥时候学会说中国话咧？有本事别躲在你家地主婆的后头，来跟我摔一跤！”

“……”我气得有点说不出话来——我是为他到现在还喊我“四川球子”而生气！为他把西安话当做是“中国话”的愚昧而生气！

“摔不摔？如果是你赢咧，全部人马都归你，如果是我赢咧，全部人马都归我——咋样？摔不摔？看你敢不敢摔？”

“摔！”

我一声大叫之后冲上去就和他抱摔在一起，到底是比他小两岁（我比习小羊也小了一岁），再加上根本就不会摔什么跤，前几跤我都被他摔倒在沙堆上了，摔倒了爬起来再摔，后几跤已经变得十分僵持，难分胜负，由于这个跤摔得越发艰难，取胜变得不易，他的嚣张气焰下去了，想自找台阶下，一边和我

摔一边说：“我……我……已经赢咧，给你算个……三比二咋样——就算你也赢咧两跤……”我摔得性起，不加理会，只是抱着他猛摔，越摔越勇越摔越有门了……

周围似乎有了什么情况：围观的孩子不再发出支招的叫喊和加油声，忽然间给静下来……

我已经顾不得什么了，一门心思全在摔跤，刘虎子后劲不行，我越摔越战上风，趁机抱住了他的腿，使出全身气力，终于将他摔倒在地，这回他可是结实实地被摔倒了，好半天愣是没有爬起来，我压在他的身上，他那一嘴沙子的可怜相令我大有胜利的快乐！

是的，我赢了！

可是周围却静得很奇怪——没有响起我期待中的欢呼——我压着刘虎子转脸一看却见在那堆围观的孩子中间站着一个大人——我一眼便认出了那是我的父亲——我那在长年的野外工作中变得黑黑瘦瘦轮廓分明的父亲——突然地回来了……

我从刘虎子的身上爬起来……

“爸爸！”我在脱口而出叫父亲时又回到了我那“四川球子”的原乡音。

父亲上前一步来到我的面前，蹲下来帮我掸着满身的沙子，我不明白他的脸为什么是红的，眼中为什么潮乎乎的似有泪光闪烁，他只是望着我，长时间地望着，然后有点哽咽地说：“索索……长大了，成男子汉了！”

周围的孩子一下散去。

“回家吧！奶奶还在家里等着咱们呢！”父亲站起身来，拉起我的手就走。

正是在这回家的不长的路上，父亲突然说：

“索索，你妈……死了！”

我不能完全明白这个“死”字：

“她不回来看我了吗？”

“不回来了……”

“过年也不回来了？”

“过年不回来了……永远都不回来了！”

“那我们就去上海看她吧！”

回到家中时，暮色已经四合，由于不曾开灯，家里面已是一片黑暗，外屋不见祖母，父亲便拉我走进更黑的里屋，迎着从窗子透进来的一丁点光亮，看见祖母仿佛一帧剪影：靠在床头，手中抱着一个长方形比四下的黑暗更黑的盒子……

当时，我无法知道我的母亲就在这个盒子里！

也不懂得死亡：她死了，已经死了，被烧成了一把白森森的灰，就放在这个黑盒子里！

四岁的我也不知道在这一年秋天的这段日子，对于我的家庭和我究竟意味着什么——

父亲是在大西北深处的某地测量大地时忽然接到祖母拍发的电报的，便给上海母亲所在的那个激光研究所打长途电话，祖母的担心被应验了，得到的一个坏消息是：母亲不但病了，而且病得很重，甚至已经病危！母亲患的是白血病，病发现得突然，病情在短时间内急剧恶化，情况危急！我在很久以后才了解到：母亲的病和最终的死竟是和我童年时代最心爱的玩具——那辆漂亮的小坦克有关系的！我的童年正值那样一个玩具匮乏的年代，我如何能够拥有那样一辆人人看了眼红心跳并且是在商店里压根儿就买不着的精致逼真的坦克？事实上那不是一个玩具，而是一辆坦克的模型，母亲在上海的激光研究所里的工作是和坦克有关——她也正是在研制坦克上的激光瞄准镜的工作中和其他同事一起出了事故的：激光的辐射毁坏了他们的血液……等父亲从西北深处先坐汽车到兰州再坐飞机到达上海的医院时，母亲已经不行了，到了她三十二岁生命的最后几日，她从昏迷之中醒来，在回光返照中所表达的最大心愿就是想最后再看我一眼，但此愿望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唉！说起来我的母亲是为了祖国的军事科技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而且美丽的生命的，当时我只知道她的死可以光荣地被叫做“牺牲”，是“因公殉职”，并且是一位“革命烈士”。一个没有上过战场打过仗的女人怎么会成为“革命烈士”并且“光荣牺牲”了呢？我不理解。翻开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编年史册：在此前一年，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我边防部队和强大的苏联军队（他们还叫“红军”吗）在东北边界的珍宝岛痛快地打了一仗——我在后来听说这事儿之后，总觉得我的母亲是和那些新研制出的坦克一起参加过这场战斗的……好像也是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玩那辆小坦克了……

在三十五年前的那个叫人沉重不支的晚上，在我家黑暗的里屋里，祖母抱着母亲的骨灰盒呆坐在床头，始终没有一句话，甚至没有发出一声叹息！到了最后，只有一颗泪珠泛着晶莹的光亮从她的眼角滚落下来，被父亲看在眼里……沉吟了片刻，站在黑暗中的父亲说：

“姆妈，不要这样，坚强一些，我们还得活下去呀！”

我越大就越理解父亲当时的这句话首先是在心里说给他自己听的——在当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加丧魂落魄悲痛欲绝的人了！我还依稀记得：到了晚上，我和祖母在里屋睡下之后，他还一个人坐在外屋吧嗒吧嗒地抽烟，伴随着一连串的咳嗽，有时候便到院子里去了，到后半夜才回来……

到了白天，在我面前，他又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母亲的死换来了父亲在家，估计是我出生以后他和我在一起呆的最长的一段时间——有多长？也许是两周三周，也许是一个月，这时的我对时间还没感觉。

对于我们这个地质队家属院的孩子们来说，一般情况是父亲长年在野外工作而母亲是在家里的，所以谁的父亲回来了谁的气就粗一些，现在轮到我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慑于站在我身后的我爹的威压，被我摔倒在沙堆上吃了一嘴沙子的刘虎子非但没有进行新一轮的挑衅，还跟我未经讲和就玩在了一起，如此一来刚刚分裂成的两拨人又合二为一——所有这个年龄段的男孩们又玩在一起了，队伍得到了重整，刘虎子强调他是“大将”，封我为“二将”，习小羊则继续做“军师”。

父亲在家，说是休息，但也要隔三差五地去一下单位，几乎每次都是带着我去的，我从成都来到西安之后还是头一回去他的单位——就是国测局地质大队机关的所在地。那是在已经很像是郊外的某个地方，从家属院步行去需要半个钟头。在父亲将我高高地架在他脖子上初去单位的路上，还经过了一个挺大的土堡形状的砖窑，只见砖窑黑漆漆的洞口边上站满了人，都在那儿伸长脖子探头探脑地朝里看，一边看一边还窃窃私语地议论着什么……父亲停下脚步，就近问了一个围观者，那人说是有人一大早在砖窑下面发现了一个死人——我嚷嚷着非要看，架着我的父亲就上前两步挤进人群，让我朝下面看，我也确实看见了：在黑漆漆的窑洞底部，一个男人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后来，穿蓝警服的警察来了，我们就离开了。

这个早上所遇到的这件事令我着实兴奋了好一阵子，我为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新鲜事而感到兴奋，回到家属院的那帮孩子中间时，我跟他们吹牛说：“我见过死人了，你们见过没有？死人！死人啊！”望着他们面面相觑瞠目结舌哑口无言的样子，我不是一般的得意……

初进父亲单位，我一下傻了眼：发现那是比我们所住的家属院大出十好几倍的一个十分好玩的地方：有一个标准的但是上面没有草坪的足球场，还有一个水泥地的灯光（篮）球场，围墙里面本来就够大的，围墙的外面还有大片的田野，连绵至远处的天边，地平线上是终南山黛青的山影……

某个晚上，正是在这里——在父亲单位的足球场上，我看了平生头一部的电影《白毛女》——不是水华导演田华主演的那个黑白故事片，是由革命现代芭蕾舞剧所拍成的彩色影片即八个样板戏之一的《白毛女》，坐在跳高的沙堆上看完该片的我，不明白银幕上的这些人儿为什么都如此奇怪地用脚尖走路，也基本上没有看懂剧情，但却很是兴奋！坐在黑压压的人群中间，望着银幕上比

真人还大的人影在不停地晃来晃去，就足以让我兴奋不已的啦！

在吃喝玩乐方面，父亲给我这个忽然没了妈的孩子来了一次恶补！

全市最大的兴庆公园距父亲单位没几步路，里面有一个挺大的人工湖，我们在上面划了船，上岸后还爬了一座假山，我从一个大象形状的滑梯上反反复复地滑下，快乐得像个小神仙，荡秋千时父亲还将我荡到了只能闭上眼睛张嘴大叫的高度……

动物园当时很小，也还没有独立，是建在莲湖路上的革命公园里的，回想起来真像是一个大猪圈，但对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说则宛若一座原始森林——我记得去动物园的那次，父亲是带着我和习小羊一块儿去的，那一定是我要求的。隔着铁栅栏，看见一只狐狸的时候，我想起了习小羊他爹——他爹身上的气味真跟这狐狸所散发出一模一样啊！我把这个感受说给习小羊听，却被父亲听见了，笑着（很少见他笑）拍了我后脑勺一下：“你小子，别胡说！”

在这些日子里，父亲还经常带我出去吃饭——下馆子，父亲说：“在成都的时候，爷爷奶奶没事儿就爱带着你出去吃饭！”——成都的事因为记不得，对我来说就不存在，我只晓得：父亲带我去吃的饭要比祖母带我去吃的好吃得多，祖母就会带我吃羊肉泡馍——这跟她行动不便，所能到达的区域受限有关，父亲则带我去吃了很多有名的地方：东五路的一家实验餐厅里的鱼香肉丝是我最爱吃的菜；在解放路口上的一家冷饮店里，我一口气吃掉五客蛋黄色的冰激凌后拉了一天稀……

忽然没了妈的那段日子，竟成了我童年记忆中最为快乐的一段时光，现在想来，那完全是父亲苦心经营刻意而为强颜欢笑的结果——他想叫我感觉不到母亲的离去，他看着我开心，自己的元气也就在暗中慢慢地恢复……

父亲又要走了，一个早晨，一辆北京吉普停在家属院的大门口等他——那辆车将带着他和他的两个同事从这里出发向着广袤的大西北深处一路开去……

他在临走的前一天，在公厕前的沙堆上专门指点了我的摔跤，教给我许多技巧、招式和动作要领：什么“扫堂腿”、“背麻袋”；什么“重心要低”、“底盘要稳”。父亲不似一般经历单纯的知识分子，他在上大学之前曾经当过兵，西南军区的，建国之初曾在云南剿过匪，和土匪面对面干过，对这一套全都掌握，他说等我大一点再教我拳击，为的是不遭人欺负。除了教我摔跤，他还教我了一条毛主席语录：“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也是我所学习并记住的第一条毛主席语录！

在这个阴凉的早晨，我和祖母将父亲送到那辆吉普车旁，在母亲离去的这段时间里，一下子白了一络头发的父亲转过身来对祖母说：“姆妈，你自己多保重吧！天气越来越凉了，注意多加衣服。”然后拍了拍我的头：“索索，你要听